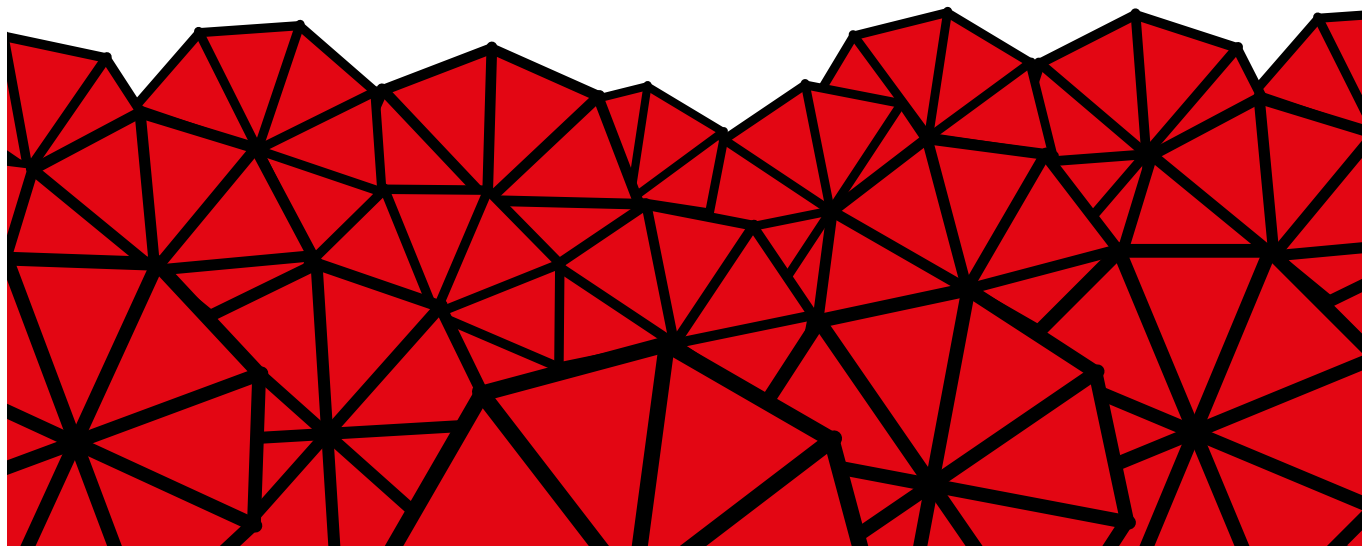




nswp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简报 压缩的空间和
被压制的声音



压缩的空间和被压制的声音

介绍

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声音正在缩小。性工作者对影响其生活的项目、政策和其他决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越来越像他们有权获得资金和倡导平台一样，要么是因为他们与性工作者合作，所以是能够代表性工作者说话的“专家”，要么是他们完全排斥性工作者的声音，因为他们拒绝承认性工作者的性工作者或尊重其人权。各种国家和国际组织看起来也是性工作者的敌对环境，性工作者被组织者有意排斥。

性工作者处于独特的位置，能够确定自己在法律、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需要，并带头进行适当的结构改革。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性工作者的声音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关于政策和项目制定的对话中被忽视或

…在全球范围内，性工作者的声音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关于政策和项目制定的对话中被忽视或缺席。

缺席。政客、“反人口贩运”活动家、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组织、宗教信仰社群等都提倡“终止需求”模式。医生、医护人员和非政府组织往往在没有咨询社群的情况下决定性工作者获得艾滋病预防和性保健服务的机会。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机制始终没有包括性工作者。即使包含性工作者，这种包含往往是肤浅的或形式主义的，或者他们被利用作为外部利益相关者获得资金的渠道。同时，性工作者权益组织长期资金不足。

性工作者遭受的后果包括：遭受暴力的风险增加；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受到限制；行动不便；互相保护的能力下降；缺乏法律保护。有色人种的性工作者、跨性别性工作者、移徙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和街头性工作者遭受的影响最为严重和持久。不能有效纳入性工作者的参与，项目和政策往往被误导、有害和无效。如果性工作者的基本人权要得到尊重和保护，就必须在所有决策机制和对话中优先考虑她们的参与。

尽管总被排斥，性工作者仍然要求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通过组织示威游行、建立伙伴关系和联盟，以及与处于权力和影响力职位的人建立关系，来寻求加入对话的途径。

本简报文件审查了性工作者的声音如何被排除在各个层面的关键空间之外。报告强调了人权、社群赋权和性工作者自决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建议，以纠正这些问题。

本简报文件审查了性工作者的声音如何被排除在各个层面的关键空间之外。报告强调了人权、社群赋权和性工作者自决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建议，以纠正这些问题。

方法

本文提供了对性工作者和其他关键信息人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性工作者受访者参与焦点小组和访谈，其中我们使用的是标准化的问卷。九个国家顾问在比利时、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加拿大、斐济、圭亚那、乌克兰、赞比亚、墨西哥和萨尔瓦多开展工作。我们共调研477名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包括一些被认定为非双性恋者。大多数人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年龄范围为18至50多岁。研究包括性少数和迁徙性工作者、艾滋病毒感染者、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城市和农村性工作者以及在全世界各地从事性工作的人员。我们还与NSWP成员组织进行了全球在线咨询，采访了来自关键人群网络（包括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主要信息人和国际妇女权利专家，从这些与性工作者合作的人员，主要是在国际机构工作的人员，听取了他们的观点。

有效参与及其障碍

有效参与

性工作者“有效参与”政策和项目制定的理念是性工作者执行工具 (SWIT) 的组成部分，该工具与性工作者一起制定面向性工作者的有效艾滋病和性传播感染方案提供指导准则。SWIT 认为，有意义的参与“对于建立信任和可持续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它要求性工作者“选择如何被代表，由谁代表，选择他们如何参与工作，选择是否参与，以及在如何管理伙伴关系方面拥有平等的声音”。¹ 2017年，来自NSWP五大区域的性工作者召开了一次全球专家会议，以进一步审查和确定性工作者“参与项目、政策和法律的设计、开发、实施、管理以及监测和评价”的标准。² 会议为性工作者被有效纳入提供了评估工具。这些资源为所有与性工作有关的政策制定和项目开发提供了全球标准。

污名、歧视与刑事定罪

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污名是持久的、普遍的和破坏性的。污名是滋生针对性工作者的歧视的土壤，并为将性工作者排除在对话和决策之外提供了借口。

“污名有其功能。它使我们沉默，并让我们没有资格去揭发。我们不被当作正常人和政治主体存在，因此，我们从未被邀请，也没人听取我们关心的问题。即使听了，也不被认真对待……污名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对我们进行排斥和歧视。”

STRASS, 法国

“污名是沉重的，让人们保持沉默。你不知道如果你站出来表明是性工作者或前性工作者会发生什么，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果。”

PRO-TUKIPISTE, 芬兰

性工作者“有效参与”政策和项目制定的理念是性工作者执行工具 (SWIT)...

1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与性工作者合作实施全面艾滋病毒/艾滋病项目》，7

2 NSWP, 2018,《性工作者有效纳入》

性工作者在刻板印象中是受害者和罪犯。加拿大、美国和乌克兰的性工作者将此归因于“反人口贩运”运动的兴起。在许多国家，性工作者作为受害者是一个写入法律的概念。例如，2016年，法国重新措辞将性工作者定义为“卖淫受害者”。自愿性工作被与人口贩运混为一谈，导致制定出的法律和政策，本意是“拯救”性工作者受害者，实际是惩罚他们为罪犯。³ 如果性工作者坚持他们不是受害者，则要么被忽视，要么有可能被当成人口贩运者的同谋。

“我们要么被认为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要么是皮条客游说团的一部分”

法律生活组织-乌克兰

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经常是受教育程度低，没有能动性。新加坡的性工作者解释说，由于“被描绘成软弱、无知和（需要）被拯救”，他们并没有被“认真对待”（项目X，新加坡）。这种刻板印象往往被当作武器，说明性工作者不能被视为没有学位的专家。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比利时、萨尔瓦多和赞比亚的性工作者都报告说，他们很难被当作合法合理的存在。

新加坡的性工作者解释说，由于“被描绘成软弱、无知和（需要）被拯救”，他们并没有被“认真对待”...

“我经常建议常光顾的社会援助组织聘请我为专家。我当了二十年的伴游，在这件事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学位。这样，作为一个性工作者，我被阻止参与。”

性工作者,比利时

把性工作者当作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使其他人声称能代表他们的需要。加拿大、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的性工作者报告说，社会文化对性工作者的看法是可耻和有辱人格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吸毒成瘾者”（加拿大）和患者（加拿大、赞比亚）。

一些国家的性工作者注意到，内部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在乌克兰，一位性工作者说，生活在污名和歧视中“增加了我们的自我怀疑”，从而“降低了我们的相关性.....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知识”（法律生活-乌克兰）。

一些性工作者，如乌克兰的性工作者，倡导对执法部门进行敏感性培训，以防止苛待和虐待。加拿大温哥华的当地警察接受了敏感性培训。性工作者说，这是在连环杀手Robert Pickton和正在进行的“失踪和谋杀妇女案件”⁴ 暴露出针对性工作者的污名化和刑事定罪的系统性问题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一位性工作者指出：“我很遗憾，我们似乎只是在悲剧发生后才被咨询意见”。圭亚那的性工作者也表示，只有在谋杀或其他悲剧之后才征询他们的意见。

斐济的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被警察拍的照片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导致社会污名和歧视增加。他们把宗教信仰作为污名的常见来源。

3 NSWP, 2014, 《战胜亚太区域限制性工作者能动性的举措》

4 Brenda Belak 及性工作者联合反抗暴力的成员, 《为什么我们必须将性工作者纳入失踪与被害原住民女性全国调查之中》, Pivot Legal Blog, 2016年2月17日

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性工作主导组织在有限的预算或完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运作。在有资助的地方,资金很少来自政府。

资助

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性工作主导组织在有限的预算或完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运作。⁵在有资助的地方,资金很少来自政府。全球基金在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有限,而其他地方的前工作人员报告说,他们主要通过国际组织获得资金,用于有限的项目活动。资助还可能附带了反性工作条款: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要求受助人签署反卖淫条款的协议。⁶

缺乏资金使性工作者没有资源为会议进行筹备、支付差旅和参与:

“缺乏可持续性。在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我们中许多人在为维持生计和支付房租而挣扎。缺乏资源来培养性工作者的领导力和行动力。”

ST JAMES INFIRMARY, 美国

许多性工作者致力于参加尽可能多的会议,但往往是个人承担费用:

“无论是否有钱,这些会议大多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提供我们想要看到的内容以及我们想有的面向性工作者的项目。”

ZASWA, 赞比亚

相反,来自非性工作组织的“代表”性工作发言的代表,往往在参会时能获得薪酬:

“当我们参加会议时,大多数人的本职工作包括参加会议,是在他们的工作时间。对我们来说,从来没有。我们没有薪酬。我们失去了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性工作, 比利时

形式主义包容

由于污名和将性工作视为未受过教育或无能力的刻板印象,多数性工作者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参与是肤浅的:

“当性工作者.....被邀请参加一些会谈节目,更突出了:我们没有注意到你,或我们忍受你的存在,但没有人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

-性工作, 吉尔吉斯斯坦

男同性恋健康与权利全球行动(MPact)执行主任George Ayala说,这种形式主义现象经常出现在联合国空间内:

“当性工作者和关键人群社群其他成员被邀请时,他们不一定被包括在内或参与。大多数时候,他们坐在那里,说他们需要说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联合国人员试图重新构建这个问题。”

5 妈妈现金, 红伞和开放社会基金会, 2014, 《报告: 面向性工作者权利的资助》

6 NSWP, 2011, 《PEPFAR和性工作》

许多国家的性工作者还报告说，被非性工作组织形式主义纳入是一种获得资助的常见战略。

“我们的参与很少被认真对待，因为当你看到当资助申请成功后，他们不回来找我们，只是利用我们写他们的申请……这表明，他们得到他们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其余和我们没关系了。”

性工作者，赞比亚

当一个捐助机构来访时，政府更经常地与圭亚那性工作者接触，“想说性工作者在场……咨询性工作者只是为了向捐赠者表明征询过性工作者的意见。”

受资助的敌人和虚假的盟友

那些受到资助在决策空间参加会议的人往往不代表性工作者的关切或利益。乌克兰的性工作者报告说，受资助的与会者包括政府资助的刑事定罪倡导者和不向性工作者提供服务的艾滋病非政府组织。在美国，资金主要通过所谓的“打击人口贩运”项目流入执法部门。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资金流向废娼主义者、反人口贩运团体、警察和信仰团体，他们认为所有性工作都是被剥削的。

不透明的官僚程序

复杂的官僚规则和程序以及决策过程（如联合国系统内的那些程序）缺乏透明度，是性工作者参与的障碍。Ayala指出，重点人群的社群代表并不总是认识到他们的声音被淹没的方式，或者他们的语言因为不熟悉复杂的联合国工作而被淡化。性权利倡议（SRI）的一位盟友报告说，这些程序“只有在那里的人才能进入……所有政府间空间或国际空间和系统本身就是对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团体有敌意的空间。”

…这些程序“只有在那里的人才能进入……所有政府间空间或国际空间和系统本身就是对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团体有敌意的空间。”

压制性工作者声音

受访者点名了一系列占据为性工作者发声的空间的行动者：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者的组织；在“拯救和康复”领域工作的；主流服务提供商，包括律师、医生和保健工作者；信仰组织；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以及从事移徙、人口贩运、妇女权利、艾滋病毒和人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

本节探讨性工作者“被代表发言”或被排除在空间之外的方式。

政客、法律制定者和政府

波特在听证会上的陈述没受到尊重或引发兴趣，所有在听证会上大声疾呼的性工作者都被忽视了。

2014年，前加拿大性工作者和Pivot法律协会董事会主席Kerry Porth向司法委员会就C-36号法案《保护社群和受剥削者法》的听证会作了陈述。⁷ 听证会推翻了加拿大以前的三项法律，这三项法律侵犯了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权的宪法权利。⁸ C-36号法案以历史性的胜利取代了这些法律，但不幸的是，它复制了许多与旧法律相同的危害。波特在听证会上的陈述没受到尊重或引发兴趣，所有在听证会上大声疾呼的性工作者都被忽视了。

“从第一天起，性工作者和前性工作者以及其他公开反对C-36法案的人就被开除、嘲笑、受到敌意的盘问和责难……我在发言中解释说，我以前是一名性工作者，在严重的成瘾、贫穷和偶尔无家可归的环境中工作，我曾与数百名处境类似的妇女共事。我的声音，以及其他现任和前性工作者的声音，应该被优先考虑，因为我们有直接的经验 and 专业知识，可以与委员会分享C-36号法案将如何影响性工作者。然而，没有一个问题问我。当我的同事艾琳试图推迟一个更适合有性工作经验的人来回答的问题时，保守党议员Stella Ambler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没时间’”⁹

事实上，在提出“终止需求”战略时，很少征询性工作者的意见。在法国，STRASS解释说，尽管他们活跃了十几年，为公众所熟知，但在围绕法国2016年法律改革的辩论中，他们完全被忽视了，并且最终实施了北欧模式：

“这就像我们不存在。我们从来没有被问到意见。只有记者来问，大多数时候也只是要获得一些故事，迎合大家的刻板印象。”

STRASS, 法国

一些国家的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被排斥在当地政治之外。在圭亚那，性工作者说，国家从未就性工作政策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在墨西哥，当国家为性工作设立“容忍区”时，没有征求性工作者的意见。在萨尔瓦多，性工作者被排除在决策空间之外，但偶尔有政客进行肤浅的接触，以满足其自身利益：

“他们来看我们拍照...并上传他们在Facebook上，他们不为性工作者做任何事。”

性工作者，萨尔瓦多

在吉尔吉斯斯坦，性工作者以最近围绕国家性别平等计划的讨论为例，表明他们被排斥在外。该计划没有提到性工作者，而且是在没有纳入性工作者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

7 NSWP, 2014, 《加拿大：反性工作法案通过参议院》

8 Darcie Bennett, 《加拿大对Bedford——705字决议》Pivot 法律博客, 2013年12月20日。

9 Kerry Porth, “司法委员会C-36号法案忽视性工作者。” Pivot 法律博客, 2014年7月14日。

在美国，性工作者提到了政治排斥：

“美国的性工作者更有可能接触和帮助被性贩卖的人，但在讨论这个问题立法、社会服务预算方面时，却得不到参与席位。”

ST JAMES INFIRMARY, 美国

在比利时，一位性工作者描述了他们在议会辩论中被羞辱和压制声音的经历：

“有一次在欧洲议会就客户刑事定罪立场进行辩论时，我想表达一下自己，[我被告知] ‘女士，既然你曾是个卖淫者，你就没有灵魂了’”。

-性工作者，比利时

原教旨女权主义者与废娼主义者组织

受访者称反性工作活动家在决策空间排斥性工作者负有最大责任。在欧洲区域，情况最为明显。“终止需求”倡导者和那些以信仰为基础的废娼主义者的立场进一步加深了性工作者是

没有能动性或自决能力的受害者的观念。这种对性工作者的描绘为排斥他们生活经验和专业知识提供了理由。

在乌克兰，性工作者报告说，“终止需求”模式越来越受到废娼主义者的欢迎，“试图通过打击我们的客户把我们从工作中拯救出去”。乌克兰法律

生活报告说，这导致性工作者“[退出]有关立法的重要关键程序”。比利时的性工作者也有共鸣。2018年12月倒下的上届政府将第三方合法化，但比利时的性工作者预计，尽管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关于性工作法改革的辩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将被欧洲妇女游说团的废娼主义者篡夺。

这种持续的排斥尤其令性工作者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认识到，代表她们发言的原教旨女权主义者既没有从事性工作的经验，也没有与性工作者真正合作过：

“他们对卖淫有看法。但是，他们中甚至没有人去过一次妓院。他们的意见很强烈。他们没有做过性工作者，不应当代替我们说话。”

性工作者，比利时

在法国，STRASS报告说，政客们受到废娼主义者组织的压力，要求他们不要与性工作者交谈。政治家们担心，如果自己与性工作者沟通，废娼主义者将发起反对他们的运动。法国的废娼主义者组织由政府 and 教会共同资助，可以组织有著名政治家参与的大型会议。他们还融入了“行政部门、工会和政党”，以确保他们持续施加影响。

反性工作运动也普遍弥漫于女权主义空间，使这些空间成为性工作者的敌对环境。一名参加纽约得妇女地位委员会（CSW）会议的性工作者报告说，一位法国部长出席时“用后背对着自己……还说她拒绝和性工作者交谈”。同样，参加2019年由法国和瑞典政府主办的妇女委员会会外活动的性工作者报告说遭到排斥¹⁰，在瑞典妇女游说团发表反性工作意见后，他们被排除在外。¹¹

10 NSWP, 2019, “NSWP在 CSW63.”

11 NSWP, 2019, “性工作者被CSW关于性与生殖健康的会外活动排斥”;

“终止需求”倡导者和那些以信仰为基础的废娼主义者的立场进一步加深了性工作者是没有能动性或自决能力的受害者的观念。

在芬兰, Pro-Tukipiste报告说, 他们和新组建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FTS芬兰, 被排除在由与欧洲妇女游说团有联系的妇女团体组成的会议之外。他们被拒绝参加讨论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EDAW) 委员会提交关于全球移徙背景下人口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一般性建议的报告的会议。同样, SRI报告说, 在CEDAW关于一般性建议的半天会议上, 废娼主义者的行为就好像“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不想听……他们会尽其所能, 确保 (性工作者) 的声音不会被听到, 这样他们就能写下自己想要的。”

许多欧洲性工作者和关键信息人指出, 废娼主义者的一个常用策略就是用一两个自认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故事作为所有性工作的代表。任何关于自愿性工作存在甚至是更常见的性工作者经历的说法都被压制。这一策略尤其难反驳, 是因为性工作者活动家不想忽视个人的经历, 但反对这种对整体性工作者经历的歪曲。

基于信仰的组织

通常与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密切合作的是具有反性工作观点的宗教组织或基于信仰的组织。

来自美国的SWOP“监狱之内”的性工作者认为这些社群, 尤其是福音派基督徒, “可能是最恶劣的罪犯”, 并指出“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赞比亚于2016年设立了官方的国家指导和宗教事务部, 该国性工作者表示, 一项2019年的国家政策“推崇基督教生活方式, 将进一步遏制性工作者的组织, 加剧污名和歧视, 从而阻碍性工作者在国内外的参与。2017年的一篇报纸文章吹嘘说, “参加宗教‘康复’计划的性工作者超过70%的已经改变了……有些已经成为基督徒”。¹² 在法国, 基于信仰组织也与与拯救性工作者的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通过压制性工作者消声而从中获利:

“最糟糕的 (为性工作者说话) 是拯救项目, 比如Mary Magdalen之家, 性工作者被‘邀请’祈祷和无偿劳动, 制作供教堂出售的蜡烛。”

STRASS, 法国

性工作者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大多数国家被调查者认为, 艾滋病防治是需要性工作者参与的主要目标。对于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来说, 艾滋病领域是一个经常展示他们的意见或至少要求他们发表意见的空间。在每一个本报告涉及的国家,

性工作者都参与艾滋病毒工作, 虽然他们参与的程度差别很大, 从形式主义的到有效参与。

在赞比亚, 性工作者说, 全球基金的受偿保护资金为他们的参与打开了大门。受偿保护资金要求政府资助聚焦关键人群的项目。2016年, 全球

基金采纳了SWIT作为其项目的规范性国际指南。¹³ 赞比亚报告说, 最近修订的《国家战略框架》首次明确将性工作者列为关键人群。然而, 性工作者的参与仅限于低水平参与, 以避免政治家和教会的反弹。

…性工作者的参与仅限于低水平参与, 以避免政治家和教会的反弹。

¹² 赞比亚每日邮报, 2017年7月16日。

¹³ NSWP, 2019, “加强性工作者参与全球基金工作的能力。”

喀麦隆的性工作者被排除在指导当地性工作者保健项目的机制之外，导致服务不能满足其需要。然而，他们报告说，他们参与了艾滋病预防工作。受访者称，艾滋病领域是将卫生部门重点扩大到除性与生殖健康外，心理健康和人权等领域的一个机遇。喀麦隆的AJO组织也称他们参加2018年国际艾滋病大会 (IAC) 是一种积极的经验，“使我们能够与其他活动家分享经验和做法，并与捐助者会面。

墨西哥性工作者报告说，通过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中心 (Censida) 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在联邦层面有一些间接参与。然而，在2019年，政府大幅削减了对这些团体的资助。在被排斥在卫生保健系统之外多年后，墨西哥的性工作者现在必须保留健康管控卡。这是性工作者的强制性证件，他们必须支付“健康检查”的费用才能在该国某些地区工作。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性工作者报告说在艾滋病项目中的参与有限。在国家 and 地方层面，性工作者参与培训、教育和宣传活动的实施，以及对这些活动的年度审查，但不包括在活动设计中。根据国家艾滋病战略计划，性工作者和其他关键人群必须被包含进来，但性工作者的参与“更多的是协助而不是真正的参与”。

根据国家艾滋病战略计划，性工作者和其他关键人群必须被包含进来，但性工作者的参与“更多的是协助而不是真正的参与”。

萨尔瓦多报告说，少数被选出的性工作者已经进入艾滋病/性与生殖健康规划工作，并参加了全球基金的国家协调机制。他们表示，考虑到该国估计有44 000名性工作者在活动，这种程度的参与可算是缺乏参与。

在吉尔吉斯斯坦，性工作者的参与经历则是好坏参半。目前关于艾滋病的国家方案部分包括Tais Plus的提案，社群代表总是能参与撰写向全球基金提交的国家申请。乌克兰的性工作者反映，尽管在CCM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艾滋病理事会的加入有限。然而，这两个国家的性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存在主要是形式主义的。

法国的性工作者承认，艾滋病运动的确有包括性工作者，然而，他们的角色被描述为“撰写不会被执行的文件”。此外，法国的性工作者在艾滋病运动中感到被歧视：

“我们被 (视为) 麻烦制造者，以及愤怒和粗鲁的人，总批评他们在我们不能参加的地方 (比如和一个废娼主义的市长在巴黎市政厅，或者有旅行限制的美国) 组织会议。”

STRASS, 法国

世界艾滋病大会2020——直接排斥

性工作者和关键信息人反映了对世界艾滋病协会 (IAS) 决定在美国旧金山/奥克兰举办艾滋病大会的担忧、失望和愤怒。¹⁴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以及代表其他关键人群的网络出于多种原因反对这一决定。对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被定罪者以及来自一系列国家 (特别是穆斯林国家和中美洲左翼国家) 的人的旅行限制使他们通常不能进入美国或获得签证。此外, 美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 针对性少数社群和有色人种的暴力正在增加。当地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反对申办2020年艾滋病大会, 但正如SWOP“监狱之内”指出, 国际协会“只与性工作者闭门合作, 但在这些计划之外性工作者的参与和努力, 都遇到沉默之墙”。George Ayala (MPact) 指出, 尽管曾听到了反对意见, IAS还是接受了这项主办申请, “违背了我们的愿望, 也违背了美国艾滋病感染者全国网络的愿望”。他认为, 这表明IAS“在知道国际社群的特定部分将不允许或将很难进入美国时, 另有想法”。与此同时, “小型社群组织正在世界各地做大部分工作”, 而会议排除了它们。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一样, 其他关键人群网络也经历形式主义的参与: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平等的席位。我们有一个形式主义的位置, 被当做背景;在围绕新的科学或政策倡议的商讨中, 我们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有一种感觉是, 性工作者、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以及其他男男性行为者、毒品使用者和跨性别者都是可有可无的。”

GEORGE AYALA, MPACT

艾滋病2020: 可喜的替代

作为回应, 计划墨西哥城召开艾滋病2020会议 (HIV2020), 这次会议将与2020年艾滋病大会日期重叠。为期三天的会议代表了NSWP、MPact、毒品使用者国际网络 (INPUD)、艾滋病毒感染者全球网络 (GNP+)、国际治疗准备联盟 (ITPC) 和国际民间社会支持组织 (ICSS) 之间的伙伴关系。¹⁵ 不仅创造Ayala所称的“无法或不愿进入美国参加会议的人的安全空间”, HIV 2020还旨在为社群组织和关键人群提供一个平等对待和体验有效参与的平台。Ayala指出, 这种聚集将是“大型国际会议的替代模式”, 并表现了“真正的艾滋病工作交叉领域可能是什么样子”。

HIV 2020 还旨在为社群组织和关键人群提供一个平等对待和体验有效参与的平台。

14 NSWP, 2018, “全球社群主导网络对IAS决定在美国主办2020年国际艾滋病大会表示担忧”

15 NSWP, 2019, “倡导者团结起来计划2020年国际艾滋病大会的替代方案。”

将性工作者的声音置于中心——包容性策略

当被要求指出性工作者可受益于包容和纳入的关键空间时，受访者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和国际论坛与机制，包括：世界艾滋病大会的有效纳入和决策权；全球基金的CCM、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各级政府立法机构；研究机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所有相关的政府部委；关于减低伤害、互联网权利和言论自由的会议；性少数健康机构；关于性别平等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项目规划；以及人权工作。

草根组织

性工作者以坚定的基层组织回应了对他们的排斥。温哥华的性工作者要求通过警察委员会会议和聚焦性工作者议题的社群项目具有包容性。性工作者说，Bedford决议和温哥华警察局关于性工作法的不执行政策是这项工作的结果。¹⁶

法国、萨尔瓦多和墨西哥的性工作者同样将本国取得的成果归功于他们的基层努力。在萨尔瓦多，性工作者集会反对罚款迫害和任意拘留。在法国，性工作者举行示威，反对影响他们的法律和政策，从而能够接触媒体，并在2016年法律辩论期间与政治家互动。在墨西哥，性工作者举行示威要求修改《公民文化法》；其结果是性工作者及其客户最近在墨西哥城被合法化。¹⁷

美国的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利用草根战略来影响法律和政策。旧金山的圣詹姆斯疗养院说，他们影响地方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终止将“使用安全套”在“卖淫”指控中“作为证据”，并在举报暴力犯罪时赦免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

旧金山的圣詹姆斯疗养院说，他们影响地方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终止将“使用安全套”在“卖淫”指控中“作为证据”，并在举报暴力犯罪时赦免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

力犯罪时赦免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该法案于2020年1月生效。¹⁸ SWOP“监狱之内”介绍了阿拉斯加正在开展的法律改革工作，目标是防止执法部门与他们打算逮捕的人发生性关系。两个组织都提到了为在纽约合法化运动所做的工作。¹⁹

在比利时，UTSOPI每月举办一次活动，为性工作者提供安全空间，让他们表达需求和提出问题。代表们利用这些内容为公众辩论和决策过程

提供信息。此外，UTSOPI通过工作使当地媒体采用“性工作者”一词，而不是“卖淫”。

16 温哥华警察局“性工作执行指南”YouTube视频，2015年12月15日。

17 NSWP, 2019, “墨西哥国会投票将性工作者和客户合法化。”

18 美国政府, 2019-20参议院法案233.

19 Melissa Gira Grant, “性工作者权利的历史性突破,” The New Republic, 2019年6月9日。

建立联盟与伙伴关系

性工作者强调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和联合基层运动的重要性。比利时和美国的性工作者指出，培养与有影响力的人的联系是一项有用的策略。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受访者说，通过NSWP和非洲性工作者联盟组织的能力建设培训支持他们参与全球基金国家协调机制的工作。地方活动者继续致力于一个图绘项目，这是了解性工作者的具体需要的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希望之后能在国家协调机制中实现更公平的代表性。

性工作者反映，他们在盟友的支持下有效参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工作。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NSWP与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亚太合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制定了影子报告准则。²⁰与性工作者权利倡导网络(SWAN)的合作产生了一个项目，为希望参与CEDAW国别审查的中东欧性工作者提供培训。吉尔吉斯斯坦的Tais Plus是为CEDAW提交影子报告用于其国别审查²¹的众多性工作者组织之一。在审查之后的几年里，吉尔吉斯斯坦拟订了一项计划，以执行CEDAW的建议，其中包括Tais Plus的一些建议，包括任命一名监督员，监测警察对性工作者的暴力行为。随后，在联合国妇女署的支持下，Tais Plus受邀讨论今年的北京会议25周年全国调查，并在调查中²²提到性工作者。

在国际妇女权利领域工作的盟友热情地表达了他们与性工作者权利运动合作的意愿。SRI形容他们打算充当“管道...以运动希望的方式。性工作者运动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希望你做的，我们就这样做。我们听运动的招呼。”作为倡导性工作者进入和了解联合国空间的盟友，SRI与NSWP围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关于人口贩运问题》的一般性评论合作，向关于法律和实践中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提交联合提案。该工作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授权的一个独立专家小组。

通过性工作者包容性女权联盟(SWIFA)等伙伴关系，其他妇女权利组织努力确保性工作者的声音在CEDAW工作等领域得到呈现。²³鉴于CEDAW先前支持“终止需求”途径，这一点尤其重要。²⁴性工作者融入国际空间，在后勤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例如，性工作者代表，特别是来自全球南部的性工作者，以前曾被拒绝获得瑞士(主持CEDAW审查)签证，其中包括2016年一名孟加拉性工作者和2019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性工作者。²⁵

在国际妇女权利领域工作的盟友热情地表达了他们与性工作者权利运动合作的意愿。

20 NSWP, IWRAW-AP, 2018, 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性工作者权利的影子报告准则。”

21 NSWP, 2013, “Tais Plus CEDAW影子报告 2008.”

22 欧洲经委会, 2019,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报告.”

23 SWIFA, 2018, 《关于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书面提案》

24 CEDAW, 《关于在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一般性建议。》

25 NSWP, 2019, 《政策简报: 性工作者和旅行限制》

全民健康覆盖——新挑战

全民健康覆盖 (UHC) 是世卫组织牵头的倡议, 被关键人群网络确定为性工作者要求包容的重要空间, 它带来了许多挑战和机遇。从表面上看, UHC似乎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 然而, 正如NSWP全球协调员Ruth Morgan Thomas指出的, “当它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时, 我们一直在呼吁人们站出来说, ‘这如何作用于被刑事定罪的社会?’”²⁶ 深度参与这项工作的是GNP+执行主任Rico Gustav。Gustav的信息是“把最后一英里放在第一位”,²⁷ 这意味着如果UHC要成功, 关键人群必须被优先考虑。“如果一个卫生系统能够实际为性工作者工作, 它很有可能对每个人都起作用。如果我们设定这个标准, 它是包容性的一个很好的标准。”

“如果一个卫生系统能够实际为性工作者工作, 它很有可能对每个人都起作用。如果我们设定这个标准, 它是包容性的一个很好的标准。”

2019年9月, 联合国在纽约举行了关于全民健康覆盖的高级别会议, 会上《政治宣言》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批准。²⁸ 对于古斯塔夫和其他关键人群网络来说, 《宣言》未能说明将关键人群定为刑事犯罪, 意味着他们很容易被排斥。《宣言》提出的是“不让任何人落后, 并首先接触最远的落后者”的意图。²⁹

持续的挑战——压缩的空间

联合国系统内的趋势是“更可接受的民间社会组织或代表 (如服务提供者和基于信仰的非政府组织) 取代社群组织”, Gustav表示, 关键人群被排除在这些工作之外就是这个更大趋势的一部分。如果民间社会组织过去有权有五名代表, 现在通常只允许一名代表。通过世卫组织内部建立民间社会参与机制, 社群进一步流离失所。从理论上讲, 该机制旨在征求民间社会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然而, 它具有古斯塔夫认为的“同质化效应”, 失去了每个群体的需求和立场的特殊性。它还有助于世卫组织避免被问责, 因为任何关于排斥民间社会组织的抗议都可以简单地转交给CSEM。

26 NSWP, 2019,《简报说明: 全民健康覆盖》

27 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网络, 2019年,《把最后一英里放在首位: 关于全民健康覆盖的立场声明》

28 联合国大会, 2019年,“全民健康覆盖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

29 联合国大会, 2019年,“全民健康覆盖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

建议

各国政府、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 将性工作非刑罪化，使性工作者能够主张其劳动权利，并积极有效被纳入参与制定相关立法和政策
- 积极与当地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合作，建立机制，在建立伙伴关系的同时扩大他们的声音
- 执法部门、地方和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应致力于敏感性培训
- 捐助者应扩大能力建设项目的资助，使性工作者能够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参与关键空间
- 在政策和项目策划以及国家计划和目标中，将性工作者列为关键人群，以便性工作者的具体需要被包含和理解
- 在国际层面，关键人群网络应继续建立伙伴关系，并作为盟友行动
- 在招聘影响性工作者生活的职位时，重视与正规教育同等的生活经验

妇女运动和艾滋病运动

- 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为性工作者在妇女和艾滋病毒运动中创造空间，并保护这些空间
- 作出政治承诺，扩大性工作者的声音，为性工作者提供领导空间；允许权力转变

媒体

- 关注性工作者示威和抗议；让性工作者进入你的平台，并满足性工作者匿名的需要
- 积极准确地表达性工作者及其需要和权利

结论

如果我们要有效地改善世界各地性工作者的生活，就要在任何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空间中关注和尊重前性工作者的声音和专业技能。污名化、刑事定罪、形式主义和排斥对性工作者生活的造成巨大后果。本文只是包含了对性工作者为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而奋斗的匆匆一瞥。

污名化、刑事定罪、形式主义和排斥对性工作者生活的造成巨大后果。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和性工作领导者机构的底层声音能够被听到。简报记录了性工作者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所面临的问题, 这些简报也会试图分析全球趋势。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 包括但不限于: 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 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 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 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 (年龄在18-29岁之间); 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 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性工作者; 残障性工作者; 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 SC349355

项目支持:



NSWP是“弥合差距——重点人群的健康和权利”的联盟伙伴。这个独特的项目致力于解决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所面临的人权侵害, 以及获得艾滋病和健康服务的情况。请登陆www.hivgaps.org了解更多信息。